

盛河提桶的文學友人

三則與先生有關的速寫

北迴線時光

開始喚他作「先生」約莫是幾年前的事。當時我邊照顧生病的家人，邊在花蓮學習詩藝，每週搭乘六個小時的莒光號，往返新竹與花蓮。

乘車的時候我常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眯著眼過濾波光，只要車體北迴，肉身的左半側便能劃入太平洋。外國乘客興奮地拍照，叫喊著藍色、光亮與美，我心裡笑他們愚昧，卻也同時用眼睛掃過沿岸淺淺的沙灘與小船。我看著一個浪人雙手划著水，黝黑蓬鬆的肚腹貼著衝浪板；當他重心穩定，其中一隻侷促的腳抬了起來。他找到適合自己划水的深度，也接收到了手划過水的感覺。

這麼早就開始追尋一個永恆的主題是什麼樣的感覺？追尋永恆，就好像浪人抬起最後一隻腳，穩定好姿勢，便可以將其做為一生的行當。

鄰坐空蕩，我的大腿上安放著先生的詩集。柴電引擎的氣味燃燒著舊窗簾，一切都是慢的，但也安穩，沒有晃蕩。我在朦朧中，看見有人打開了摺疊門，縱身躍入無窮的山谷。

大先生的書房

我曾在以先生為名的書房工作。這裡除了擺放先生讀過的書目與著作，也當藝文空間，擺設私人紀念品—例如打字機、手稿與信件。我才剛到職就鬧出了笑話，錯把墨水瓶任成了哮喘藥，詢問負責書房業務的師長：「楊牧老師有氣喘？」師長先是一楞，然後哈哈大笑，這件糗事便成了書房內的趣聞。

後來師長邀我來修她的英詩課，但我只旁聽了兩堂，便以其他工作緣由推辭了。某日，師長前來關切，倒也沒提起修課的事，只聊了先生的譯作與專書，

然後送了幾本外國詩選給我，說等日後空閒下來，再來修課。

過了幾個月，師長走了。夜裡，我關掉社群軟體，內心一直有螺旋槳斷續打轉的聲響。我坐在書桌前，翻開師長贈與的詩選，才真正聽見一聲類似乾枯樹枝斷裂的聲音。這一切發生得太快，直到清晨我才回過神來，發現我只是「看著」這本詩選，迅速翻過一頁又一頁；中英夾雜的詞混雜在一起，像鹽粒，組成了大海，成為嶄新的語言。浪花一天比一天更白，更兇殘。

與兩位學長談論主義

講座結束後，我與兩位學長們走在文學院外側的石磚路上。我們喝了一點酒，將拘謹的肌理暫時鬆開，感受深夜花東縱谷的大風。我自言自語說，真想偷潛入楊牧的宿舍看一看，就算老師住在西雅圖，宿舍裏頭應該只有虛無。走在最前頭的學長 A 忽然轉頭，傻笑著說：「如果你進了門，發現老師真的在裏頭，對著你說：『我就是楊牧』這是寫實主義。」

「那麼，若他反問『你是楊牧嗎？』又會是什麼主義？」我問。夾在我們中間的學長 B 回應道：「應當是現代主義。」我又繼續問道：「然後你出了門，聽見楊牧在你後頭說：『你其實並未來過』這叫做什麼主義？」學長 B 搔了搔腦子，彷彿能從皺褶中摳出詞彙，他說：「存在主義？」

我看見學長 A 將最後一口酒喝完，打嗝，擦了擦嘴，抽兩下鼻子，拉高音量說：「如果，老師一直都端坐在那裡，從未離開過，那是什麼主義？」語畢，一陣大風推倒了一輛腳踏車，打斷我們尚未完結的談話。虛無敞開這一切的大門，但誰也卻看不見裡頭。

生活哥的認可

現在回頭想想，自己有意識地想成為作家這件事，好像是這幾年才開始萌芽的。寫作剛好十年，出了三本書，拿了一些獎，生活依然亂七八糟，寫作這件事好像從蔓生荊棘裡生長的花朵，成為作家就好像園丁，對著有限的萬物修修剪剪，有時偷懶，有時勤奮；而時代也在進步，以前天氣主宰了豐饒的可能，但現在有溫室與水培法——創造些什麼，這件事似乎沒這麼困難了，真正困難的事開始狐疑起自己的身分——我真的是一個好園丁嗎？或著，作家是什麼？寫作技術與科技的進步，讓創造這件事的門檻不再這麼高了，但隨之而來的是上限也拔高了許多，以及對於認可這件事。

這幾年我的工作就是教詩，學生常常會問我，老師什麼是詩？我心裡想：我怎麼會知道。詩歌這個東西存在四千多年了，不停在演化，除了韻律特徵外，真的很難用一個鼻子兩隻眼睛這種方式去歸納。我想作家也是這樣，從前可能是在印刷品（書、雜誌、報紙）上發表或集結才算是作家——畢竟，只有書簡和樹洞是不夠的，你最終還是要面向人群，就算是把自己關進象牙塔的詩人，都會有優秀的出版人將他帶往人群，得以讓後世看見這些巨作。自媒體的進步似乎也驗證了這個道理，門檻守門人（例如副刊或是雜誌的主編）的存在慢慢地減弱，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媒體上發表文字；起初，這是一件好事，但隨後又造成了新的焦慮。

我記得大四那年，我累積了大概四十首詩，常常會貼在臉書或 IG 上給大家讀，有時能收到愛心或是留言就很高興了，但我不滿足於只有在網路上發表，於是想試看看自費出版。理由很簡單，因為我愛看書。翻書的觸覺很美好，紙頁也有味道，在視覺上，每本書的字體與排版都不太一樣，每一本書都是一個生態圈，我想抵達那裏。這跟網路發表不太一樣，那時候我在臉書發表作品，為了不被版面硬生生換行以及篇幅問題，我每首發表的詩都盡量控制在二十行內，每一行十個字以內，導致我的詩看似簡短精煉，但實際上陳述與敘事性很少，都是以意象為主，這點是我在第二本詩集出版前才慢慢意識到的事，一開始我把它當作一種「戴著手鐐腳銬跳舞」的文字鍛鍊，但我慢慢發覺，手鐐腳銬戴久了，人會不自覺把它當作金項鍊，我自以為美麗，但時時刻刻被囚禁。寫作

不只是文字鍛造，還得有敘事意志，而一本書的完成，可能就是敘事意志的開端。

讓我慢慢改變這些觀念的，是「一本書」的想法。作家如果能出版一本書，是一件美好的事。用一本書的方式去思考自己的寫作，用一本書的方式去傳遞想法與感受。也許在自媒體的時代，作家的門檻並沒有這麼高，電子報與平台可以與紙本並駕齊驅。但唯有書這個東西，是我認為無論如何，所有以作家為目標的人都可以去嘗試的東西。

同樣是大四那年，我詢問一些前輩作家，關於出版的事宜，有些人建議我可以出版小誌（Zine），也有些人則建議投稿看看出版社。但令我印相深刻的，是一位出過書的詩人——他對我說，當作家一點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生活，你老想著要出書是不對的，你應該好好去工作。這些話我大概聽了三成吧，因為我不服氣。一方面是覺得每個人的生活都不一樣，叫人好好去過生活這句話，對我來說就像有人跟我說要多喝牛奶才能長高，但我有乳糖不耐症。二來是出書這件事，我只是想嘗試看看，不能就算了，但卻人當作一種功利的行為，這實在令我難受。

後來，我跑去唸東華創作所，打算給自己兩年的時間，如果有寫出像樣的東西就出版。過了一陣子，有幸得了一個獎，陸續有出版社跑來尋問出版意願。在獎項公開之際，那位詩人（我們就叫他「生活哥」好了），傳了一封冗長的私訊給我，內容大致上在說，得獎只是一時，生活則是永無止盡，不能因為得獎就變得驕傲，接下來要更靜下心，不以當作家為目標，沉寂一段時間之後，再去寫作。

「你家住海邊嗎，管這麼多，關你什麼事。」

我很想把這句話傳給他，但突然覺得，如果傳了，不就落入了他對我驕傲的評價陷阱了嗎？我依舊跟他道謝，並且著手準備出版事宜。後來想想，當初會想

出書當作家，好像就是這一位生活哥的相逼——你越是這樣講我，我越想出書，越想好好當一個作家。後來出了書，有幸拿到書獎，有一天，我在搭捷運的時候，突然有股迷樣的感受從我腦中迸發：我好像是一名作家了。我把這種狀況告訴心理醫生，醫生說，這個是一個人，終於認可自我的一瞬間。

寫作者——或著是，作家，真的需要出版一本書，才算是有資格嗎？我覺得這個問題意識很恐怖，因為它背後的狀況其實是認可問題，而不是數字問題。傳統的門檻可能有編輯，而自媒體繞過了審核門檻，一方面有多元發展，但實際讓也去掉了一道認可的門檻。然後是出版，與專業人士（編輯、審稿人）的交流，其實無意識之間也是一道認可。想到這裡，我突然能理解自己問什麼當年不滿足於社群發表詩作，想要自費出版詩集了——我不但想要認可我自己，我也需要他者的認可。至少，我是以他人對我的期待與認可而活的，所以如果少掉了傳統的出版，我會相當難過，因為出書這一件事情，就是一道對自我與讀者之間雙向的認可機會。

那些對我說要好好獨自生活，寫作就是關起來自己寫，不需要認可的人，我只能給予尊重，然後在心裡暗罵關你什麼事。就好像當年那個生活哥，在我出版第三本書的時候又私訊了我；由於我第三本書是短篇小說，他對我說，身為作家，如果不好好專心在一個文類，是一件很可恥的一件事，不能什麼都想要，你這樣太貪心，那些得過兩個文類以上獎項的人，後來都不有名。

「喔是喔，你去跟大谷翔平講啊，叫他不要投打二刀流啊。」

我把這句話憋在心裡，因為這些年來，我已經慢慢藉由讀者，累積起了認可感與自信心。生活哥的私訊，或是假冒為認可的善意，對我來說是一個供人消遣的笑話。無論出書，無論在哪裡發表，我想有志當作家的人，想積極地讓作品被公眾廣泛、正式地閱讀和接受，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。如果將來的某一天，自己開始對作家的身分開始狐疑，也許可以詢問自己：我是否有用寫作這回事，試著傳遞思考，並理解他人呢？如果有，那麼你就是一名作家。

品學兼憂的市長獎得主

小時候聽到補習班老師的爛梗笑話，全身都會起雞皮疙瘩，例如：帥只是一個字，但它跟著我，一輩子。我心想，帥與帥只差了一槓，那一槓好像道德的底線，講這種爛笑話是沒道德的。

後來自己當了講師，也常常說笑話，我終於也成了沒有一槓的人。但我聽從前輩們的原則：玩笑只能開在自己身上，因為別人身上的玩笑，都是悲劇。

我想起自己也缺失了那一槓，準確來說，是缺失的一個人字部。憂。我記得曾有個老師告訴我，我是個品學兼憂的孩子。

那時候我就讀的舊社國小是新式小學，校方說，他們會採取現代工法（當所以其他小學是古代嗎？）會有開放式建築、明亮設計，兼顧安全與生態。所以，校園裡有生態池、綠地、廣場，校方一再強調，小孩子要在「生態教育」與「友善環境」之間學習，才能好好成為大人。

對，大人。我們從來不能當自己想當的大人，大人這種東西好像就是被環境設計好的。

我是在小學二年級從載熙國小轉學過去的，原因就只是離家比較近，這樣我就不用穿越高架橋的出口馬路，跟超大貨車爭道。這裡一開始真的完全沒有圍牆，田徑跑道蓋在天上，生態池裡面有吳郭魚，足球草地有上下陡坡，你可以站在山丘上射門，但人會隨著慣力滾下去。

我們每兩周可以給自己安排一堂「小荳荳」課，內容是學生們主動創意設計課程，讓大家一起學習。草部的豆，意味著讓學生像小種子一樣，彼此分組聚攏，在課程裡自己選題、規劃、執行與發表。

例如有些人喜歡卡牌，他們就會每兩周花一些時間來設計規則與美術；喜歡鳥類的同學，就會聚集再一起用望遠鏡看附近的鳥，那時候新竹有很多五色鳥

（當地人都說「花仔和尚」），我對牠們很感興趣，原本想跟著其他女同學一起去做鳥類觀察紀錄，但在某一天晚上，我看在 HBO 上看了一部電影，原本對鳥類的熱情全部被取代了。

那時候很流行法國跑酷電影《暴力特區》，有很多男同學都會在下課後，都會在

放學途中上飛下跳。有同學提議說，大家可以在「小荳荳」課程中，練習建築物之間蹦竄，沒道理只有法國人可以飛簷走壁，我們早就有金庸武俠了，我們也可以。那位同學說。

三年級。當時的代課老師是一個退休的老奶奶紀老師，山東來的，上課一直講古，每天叫我們稱讚蔣委員長以及蔣經國。可能是耳朵聽不太清楚，她覺得男孩子們之間流行「法國跑步」是一個很歐化又可以強健體魄的浪漫行為，沒有多說什麼就同意了。那時候我跟兩位同學楚謎與老郭每天都會翻跟斗跟倒立跑步（可能是因為這層關係，我長大後只要喝醉酒，就會倒立跑步），學校裡已經沒有什麼平面空間可以滿足我們野獸般急奔的本能了，我們的行徑因此從平面改成了立體。

那時候我長得很高，跟我現在的身高一樣高，但從小學三年級之後，我的身高就停留在 166 公分，主要原因是因為打籃球扭傷腳踝，跑去給國術館做治療，結果老師傅把我腳底生長板扭斷，骨頭在癒合之後，再也長不高了。

楚謎濃眉大眼，長得很壯，常常會對著人大笑，是那種一笑起來，會到處四仰八叉，在地上打滾的小孩。

第一關就決定從音樂樓的二樓往一樓跳。

音樂樓。我們學校很特殊，音樂樓是獨立的 1.5 層樓的設計，但在我的印象中很少辦音樂會，都是選舉時拿來投票或是開全校家長會——也就是說，這裡不但人煙稀少，樓層高度也不及二樓，摔下去不致死，頂多讓旁觀者到減壽。

楚謎是第一順位往下跳的。他不知道從哪學來的五點著地法，在墜地的一瞬間，雙腳併攏，先以雙腳接觸地，然後依序以小腿樞紐、膝蓋、臀部、腰部與後方這五個點進行翻滾，巨大的衝擊力由這五個身體部位依序吸收。日後，他變成了職業軍人，我想這應該與這一次的跳躍有關。

老郭過了好幾分鐘才往下跳。老郭後來成為了一名優秀的藥師，若以俗濫文學藝術加工的脈絡來說，他應該在這一次的行動中摔斷腿，或至少大規模擦傷破皮。但老郭也用了五點著地法，姿勢比楚謎還要正確，甚至在翻滾一陣子後，原地向我比了一個 ya。

我那時候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五點著地法。

我一躍，天沒有旋，但我滿地在轉。我只使用了手肘這一點。

有路過的其他班老師放聲尖叫去喊人，訓導主任廖老師把我抱起來送保健室。最終結果是我的手肘留疤，骨盆稍微錯位。

在保健室，楚暹跑進來看我的情狀，他說前一天晚上看了HBO電影台的戰爭片學會五點著地，哪知道我没有看；老郭說當下看著楚暹的姿勢，一下就學會了，以為我會模仿我的動作。我哪知道這兩個人學習能力這麼好，難怪一個考上軍官，另一個考上藥師，我連汽車駕照的筆試都差點考不過。

事後，紀老師非常生氣，隨口說了一句：「這麼會跳，為什麼不從一樓跳到二樓？」

我以為這是懲罰。下午三點放學之後，我在音樂樓的門口，不停擺動雙手往天空前進。

楚暹與老郭蹲守在旁邊，幫我喊次數，他們也搞不懂我到底受到什麼懲罰，只知道彼此躲過一劫，為了義氣，至少要在旁邊幫忙數數。

大概數到黃昏的時候，廖主任才發現了我們，一一遣送回家，然後挨罵。

紀老師在期末點評時，在我的聯絡簿上寫道：「知子驚鈍，品學兼憂，爾等應送其入伍，方可磨去稜角，以教化除去頑劣，否則造成社會困擾。」

我爸說，紀老師的字真好。那個時候還沒有直升機家長或恐龍家長這個詞，我是不打不成器的最後一代，但我爸好像懶得打我了。

似乎是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好像變成了被放棄的人。

之後的一小段日子極為相似，無外乎是跑跳與受傷，以及做遙不可及的夢；例如身高長到兩百公分去打NBA，或是成為台灣最厲害輕小說家。那時候還金融海嘯尚未蒞臨，吃飯可以故意剩下來一點，裝作家庭富足，有餘韻的樣子。

小六畢業前夕，我與母親將小學六年來的聯絡簿通通翻閱，想在封存於塑膠箱之前，再看一眼；當我翻閱三年級我問母親說，品學兼憂，老師的優少了一個人部，真好笑，老太婆，連字都會寫錯。

「她沒寫錯，」母親說：「就是這個憂。」

當時我還在嘻嘻哈哈，不曉得母親在哭。

過了好多年後，當母親摘除子宮腫瘤，在半夜的病房焦慮到發慌時，我才想起這件事。那時我處在論文口考的前一晚，母親轉院到花蓮門諾醫院，我住在壽豐，接到消息時，父親已經將母親安頓在病房內了。短暫的會客後，母親為了應付明早的手術先行睡去，父親催促我趕快返回宿舍，為明天的口試準備。我走到醫院外頭攔計程車，但發現口袋裡只剩幾百塊，幸好詩人陳延禎正在附近吃消夜，叫我去先陪母親，他會在旁邊的停車場等我。

「媽，」我趴在電動床旁說：「小時候那個老太婆老師，說我品學兼憂，但她寫的憂，好像沒有人字部欸。」

「沒錯啊，就是沒有人部啊。那時候很多人都.....看不起你？」

「什麼看不起，那時候我才小三而已，哪有什麼看不起。」

「有，就是看不起。那時候學校有一半的老師，恨你恨得要死；你功課很差，怎麼教都教不會，還會帶其他小孩去受傷。」

「有這麼誇張喔。」

「但另一半老師很喜歡你，你很熱情活潑，什麼活動只要有你就會很好玩，而且你不會照顧弱小.....」

「停停停，這麼多好話，如果我把這些寫進散文去投文學獎，評審一定會覺得我在臭彈（tshàu-tuānn）」

「你記不記得你小學六年級時得市長獎？」

「記得。」

「那時候有很多老師跟家長跑去跟校長抗議。」

「抗議什麼？」

「就是『憑什麼』啊，功課這麼差，班排倒數，憑什麼拿市長獎？」

「對耶，幹笑死，我憑什麼。」

「你正經一點。但你當時的老師——不是那個退休代課老師，是你的二年級跟六年級的老師，兩個人力保你，你才得獎的。」

「我記得市長獎禮物是一個電子辭典，裡面有電子雞，如果持續忘記餵它，它會跳出訊息說：『都是你！全都是因為你！』」

「你講到天邊去了，正經一點，」母親繼續說：「我忘記她們的名字了。」

「好像一個姓吳，一個姓黃。」

「對，文燕老師跟淑娟老師。你真的要感謝她們。」

對，我記得。尤其是小二的班導師。那時候我剛轉學到這座國小，起初，我靠著旺盛的精力與明亮的嗓子交到一些朋友，但後來我逐漸發現，某些大人、家長、老師不太喜歡這樣的孩子——準確地說，他們不喜歡孩子們伸手去探索自己未知的事物。「世界太新，很多東西還沒有名字，必須用手去指。」我記得當時在新竹市立圖書館的藏書中看到這句話，只因當時大人們警告我「安靜」點，不要帶壞其他同學，於是我放學後不去玩耍了，安安靜靜一個人待在圖書館看小說，看漫畫。我的班導師吳文燕小姐發現我不太對勁，放學時特別把我留下，送我一本繪本《你很特別》。我記得她對我說：「馭博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只是很特別喔——」這句話好像有某種魔力，隔天我的精神馬上回覆到以往。

「尤其是文燕老師，他喜歡散文，可惜你寫詩。」

「沒想到吧，品學兼憂的市長獎得主也寫詩。」

母親一直笑，笑到傷口都在痛。

探望母親的時候，正值八月，花東悶熱，颱風正在太平洋上空蓄勢待發，數千年前死去星體的光穿越時空點亮我的瞳仁；我離開病房，站在停車場的路燈下，人工的光將我的臉烤得發燙。

我不知道明天的口考將會如何，也許我的詩作將會被評審批得一文不值。朋友來載我了，我上車，車體停在十字路口等待紅燈時，一輛小藍色發財車披著光幕，從左側飛馳而過，像一件巨大的投光器，在我閃光過深的視網膜中形成一片簾子，它好像在審閱不同時空的記憶。綠燈亮了，光線將大霧抽解成絲狀，我們穿越數根光軸，繼續往木瓜溪的方向前進。

現代詩被當掉的詩社社長

2013 年，我剛接觸詩歌，大二期中考前的詩社社遊（大家還在火車上邊讀文字學）去花蓮三日遊，順便去太平洋詩歌節朝聖。那年的主題是「向楊牧致敬」，在亞士都飯店的朗誦會排場可真大：顧彬、蜂飼耳、管管、陳育虹、陳黎、楊佳嫻，台上台下通通都是詩人，隨便一腳都能踢翻他們擱置在地上的包包或咖啡杯。那年是我第一次寫詩，第一次去太平洋詩歌節，第一次去花蓮，我一腳踢到楊佳嫻的咖啡，把外套放在孫梓評的背包上，不小心跌倒在顧彬懷裡

聽吳懷晨朗誦〈不尋常的浪〉、聽焦桐朗誦〈海岸七疊〉，最後楊牧也朗誦了〈春歌〉。老師的聲音細長穩當，整個詩行因他的聲音逐漸宏大，好像當天下午奇萊山山稜線上的雲。

「比宇宙還大的可能說不定

是我的一顆心吧，」

會後，學長 洪崇德（Ben Chung-Te Hung）塞給我一本《年輪》，鼓勵我去找老師簽名、攀談。但我太緊張了，對他老人家一陣嘿嘿嘿傻笑便跑了。離開亞士都飯店前，我到處都找不到我的外套，最後發現它安放在孫梓評的包包上，而梓評老師也在原地等待外套的主人回來；我對著他尷尬微笑，梓評老師也報以我更多不失禮的微笑（？）

去年有幸被陳黎老師邀請到太平洋詩歌節，中午吃飯時，老師說這應該是最後一次詩歌節，之後再也沒有了，就算有也不會像 2013 年楊牧朗誦會這麼大的盛況。我想，之後這種「遍地都是詩人」的場合，大概會越來越少吧.....

大概是從那時候開始，我才開始想寫詩。

盛河提桶的文學友人

前幾年的早上，我站在某捷運站的六號出口，突然感到一陣暈眩，早晨的一切逐漸成為模糊的光球。我呼吸急促，小腿肌緊繃著，膝蓋彷彿石化，我勉強讓身體移動到附近的花圃，坐在水泥壇上。

那天上午的風很大，對街有建築工程，藍色的帷幕像海浪在飄動，儘管鼻腔能聞到水氣，但我絲毫沒有感受到鹹腥與鹽粒的饋贈；風將砂礫刮到我的臉上，我的視線隨著風的方位，開始往天空望去：遠方有低厚的積雨雲，視網膜傳到視丘的殘影也開始暈開，雲就好像死蛹或空殼。

我想起了一件事：我已經很久沒看見蝴蝶了。以前在花蓮念書，朋友們都擁有雙筒望眼鏡。我對鱗翅目的研究不多，但每每返回宿舍，我都會將腦中模糊的影像與圖鑑對照，就好像參照一首翻譯詩與原文之間的關係，我竟發現了許多令人欣喜的細節——如果要描述這種感受，大概就是在冬季的早晨接觸到陽光：皮膚震顫，鼻腔通順，萬物清晰。

天降暴雨。首先是纖細的金屬絲，然後才是黑暗的水瀑。一切原先從記憶中攜帶而來的感官都被取消了。世界突然從原先的無垠，變成了一間密室——準確來說，是一種黑暗無盡延伸的房間，而我不知道出口的門在哪裡。

我突然萌生一個念頭：我要辭職。我已經連續好幾週工作十二小時，我的薪水才三萬出頭，就連租屋處附近的五十嵐店長都問我要不要辭職來他那上班。聽曾經研究鱗翅目的同事M說，她曾在上班的中午休息時間，在公園地上發現死去的雌蝶，腹中有尚未誕生的卵。於是，她決定辭職，回到南部生活。

有時離職的原因並不複雜，可能是去更遠的地方看一看，但這是物理層面；在

心理層面，因為人們不了解內心那個想企及的目標，於是需要時間讓思想成熟，也需要空間讓感官茁壯。

我離職，交接，被主管叫去小房間責難；若非我有錄音，我還真的不記得被罵了什麼難聽話，當下我的腦中只嗡嗡地浮現里爾克的詩：「你必須改變生活。」那段時間我都會去淡江大學的圖書館讀博拉紐的小說，在公車上，我反覆聽著主管咒罵我的錄音檔——當我快被罵到哭出來時，他的怒火聲腔突然放軟，坍塌在沙發座椅上，並且持續嘆氣：「如果我跟你一樣能出書得獎，我也可以很善良啊……」

我記得當時萌生了第二個念頭：我要寫作。我想找到一處安身立命的所在，能夠容納我所有的共情和創造。記憶伴隨著感官，它擁有餘痕，必須花上好長一段時間去探索——在那之間，現世將會饋贈所有細節，而我必須用寫作來抓住。倘若有一天，我不再珍惜生命中相遇的每一次奇蹟，那麼，也許我將會獨自一人哀傷地死去。

後來，我一邊打工，一邊寫作，也試著投國藝會和文化部的創作補助。幸運的是，我在失敗了四、五次之後，終於拿到一次詩集的補助。我很感激這一筆不小的金額（至少對我來說很夠用），它讓作家們能夠分擔生活壓力，有金援去做田調和文獻搜集，讓作家們短期內能稍微專心寫作。我看過幾個認識的作家，不管是虛構、非虛構、詩歌書寫者，他們都在獲得創作補助後，讓寫作途中累積的天份瞬間被點燃——他們就像日本小說家白石一文在《沒有你，我無法成為小說家》提到的，透過每日持續鍛鍊、閱讀和思考，累積名為才華的總量。而心無旁騖，能短暫夠專注的寫作，也許就是燃燒薪柴的方法——讓自己不被麻痺，能夠持續保有惻隱、反思、不忍，加上足夠的熱情，好看的作品就出來了。

在補助公告出來後，我收到一位文友（我並不認識他，我們只是臉友）傳訊息碎碎念，內容大致上是說，我不好好工作，天天想著辭職躺平，盛河提桶？

（他真的這麼寫，很有隱喻性），我妄想靠寫作一夕致富，妄想靠寫作入室（他

應該想寫「入仕」)；寫作是孤獨的事，應該要像他一樣，關起門來，少一點發表慾望，拒絕一切金錢和名譽的誘惑，安安靜靜地寫。

乍聽之下，很像蠻有道理的，但又覺得這一切的勸誡都很廉價，對象是誰都可以。如果這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對自己的反思，那麼他也許力圖變化，想藉由沉澱讓作品擁有更多可能；如果這是一個初學者對自己的勸誡，那麼他擁有可貴的自省能力，大家以後一定會喜愛他的作品與人格。

當時的我內心急躁，不斷解釋自己還是有在努力賺錢養自己；我辭職，只是發現自己不適合做辦公室，同時也想擁有多一點時間寫作。在經濟上，我這一輩子都無法滿足父母和社會的期待，那麼，至少在心靈上，我要滿足對自己的期待。

能夠憑空創造出什麼，是多麼讓人欣喜的事情。

過了一陣子，那位文友發文說，因為自己的作品沒有被報紙刊登，所以他瞧不起在報紙上發表作品的人。我被刪了好友，甚至在被封鎖之前，收到他最後一次私訊，大致上在說，他認為我是一個自私的人，看到優秀的作品（言下之意指得是他在臉書上發表的文字）沒有點讚分享，位居高位，驕傲自大，不願意幫助默默無名的作家。

我努力檢查他有沒有寫錯字。嗯，沒有。看來他的情緒很平穩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也檢查了一下自己的臉書頁面，看看有沒有犯下什麼錯誤：很少回留言，罪該萬死；只按讚不按愛心，天理不容；持續宣傳自己的講座，不懂藏鋒；講自己評文學獎的趣事，炫耀地位；寫自己遇到的奇葩倒霉事，花枝招展；貼書摘或自己的翻譯，假裝用功。

我當下突然很感謝 [instergam](#) 與其他自媒體的文友們，大家都只會傳貓狗影片

和迷因給我，真的是感激涕零，請繼續這種行為。

接著，我點進他的臉書頁面：他的頁面都是詩，滿滿的詩，自己寫的詩，標點符號很亂，全形半形參雜。他在一天前寫了一首詩。是一首以許多年輕作家的書明串在一起的詩，但內容偏向吐槽與揶揄這些作品，結尾還溫情地表現出大家可以多跟他學學。

我對這位盛河提桶的文友印象深刻，他很像智利小說家博拉紐底下的角色，但似乎缺少了一點理想與神聖性——例如博拉紐曾寫一位長得很醜的憋腳詩人肋普林斯（音譯：王子），他被文壇大咖瞧不起，儘管他潛伏極權陣營，暗中救助許多流亡作家，但大家都會以他的寫作地位「引以為戒」，儘管他曾發表過具有巨作潛力的長詩，但他卻將其燒毀，義無反顧去做吃力不討好的事。

我愛博拉紐筆下的角色，他的小說不是文壇八卦，而是藉由文壇反射出歷史苦難之中稀少的人性光輝時刻。

如果要我給什麼關於寫作的意見，我會建議，遇到這種盛河提桶的前輩或同輩文友就直接封鎖；後輩可能還有救，因為每個人的心靈都可能會失守，但如果日子久了，他還是這副德性，那只能說佛度有緣人。

至於為什麼我遲遲不封鎖這些人？除了封鎖不完，還有另一個原因：有一次我在演講過後，被另一個文友（也具有盛河提桶的特質）當面嘖嘖歪歪。內容我不記得了，大概又是年輕人的寫作如何如何，自己的作品被埋沒了嘎拉嘎拉，大家都瞧不起他吧啦吧啦。

講座結束後，我的女朋友問我當時在跟誰說話。

「喔，我在跟我的小說人物講話。」

希望他可以成為我的肋普林斯，儘管機率很小。不過就算無法成為肋普林斯，他依舊可以讓人以另一種的方式引以為戒，不失為一種人格典範。

可能是體質或是八字問題，每隔一陣子，我都會遇到具有盛河提桶性質的人們，但他們都能成為一種勸誡：寫作者要善良。

對辛苦的譯者和出版人員表示尊敬，對活動現場人員禮貌並且不添麻煩；對他人宣傳給予你幫助的師長之姓名，等老了之後才寫下給予你打擊的師長之姓名；對身體欠佳的前輩表示關心，對陷入低潮的後輩提供安慰；對真誠提出讀後感想的讀者表示感激，如果寫作的朋友暫時陷入嫉妒情緒就給予包容，並相信他會寫得更好。

如果可以，去對自己的父母表示感謝（前提是他們沒有傷害你）；愛自己真正的文學友人，更愛了解自己的枕邊人。對認真持續創作的人獻上敬意，因為這是一門永恆的行當。

漫長的邪惡

1.

我的父親開車載我，從桃園一路到台北。父親特別挑了會塞車的時間，讓旅程變得漫長，漫長到我們足以數清楚我們的邪惡。父親露出笑容，這三十年來，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他笑得這麼快樂。母親在副駕駛座，同樣笑得很開心，她說工作崗位的年輕妹妹們都很同情自己的遭遇。

我們邪惡，因為我們做足了此事。平常我們不談論此事，因為父親會沉默，母親會哭泣，我會感到厭煩。但只要脫離了當事者——此事——就不再令我們痛苦，儘管我們認知為邪惡。

那是一個寧靜的夜晚，我假日回老家吃飯，晚上工作撰稿。她沒敲門，闖了進來：「其實，我什麼都知道——」她用了這種方式當開頭，宣告一切都是非虛構的，一切都是百分之百的真實，在她的大腦裡。

「其實，我什麼都知道，都是你變成作家，那些韓國明星才會監控我.....」

2.

「其實，我什麼都知道，都是你變成作家，那些韓國明星才會監控我.....」

父親盡可能還原她的口吻，看著後照鏡問我：「我模仿得像嗎？」我點頭，副駕駛座的母親也點頭，「而且她還說，是我以前賺太多錢，只會用錢擺平她，說我沒有愛。」

「是我害的嗎？」父親問。「可能喔，可能是你害的。」母親答。接著又一連串爆炸笑聲。我的母親痴痴地笑，短暫拍手鼓掌，開始某種前奏：「她也說是我害的，」母親說，「其實，我什麼都知道，」母親也還原起她的口吻，「妳忌妒我比你聰明，一直拿我跟別人家小孩比較，把我毀了，該成功的應該是我，不是弟弟。妳欠我一輩子。」母親重覆道，「妳欠我一輩子。」

「是我害的嗎？」母親問。「可能喔，可能是你害的。」父親答。爆炸笑聲的火

藥量稍微減少了些，煙硝很快就散去了，接下來是沉默。

這些事是真的嗎？還是多少有些虛構？任何一方是否加工了什麼，讓我們談起現實時如此窒息，需要瘋狂大笑，好讓我們能呼吸？

邪惡。是邪惡讓我們呼吸。

3.

邪惡的發生很短暫，常常帶給我們不真實的感覺，總要別人提醒。這份提醒出自兩處：一是感性，二是當事者。當我開始言說，想自述自己的邪惡時，我的理性掐住喉嚨，讓我把音節嚥回去。理性替我說話：人應該逃跑，正常人也會失守，要學會照顧自己。

無情的敘述機器。面對此事，我得成為機器，不能讓感性淹沒我。

感性的邪惡。

她對世界的認知是一條單向道。道路以外皆是廢墟。但基本上，這些都是物質。我們出生起就擁有物質生活，直到 2008 年金融海嘯，我們家破產了，才開始尋找精神。父親找到了，在新的工作場域上培育優秀人才；母親找到了，在宗教場域上，經典讓她獲得了寬慰。而她呢？她索要金錢，投資生意，背叛合夥朋友，朝著眾人怒吼。直到目前為止，她沒有接受現狀，生活條件的艱辛沒有讓她理智一點，彷彿只要接受了理智，自己也跟我們一樣，變得邪惡。

她繼續架空著感性，也不接受理智。物質搖擺在這兩者之間，分泌出激情與瘋狂。她聲稱，我們欠她以下幾種東西：愛、金錢、創作。

創作還是欠著比較好吧？

創作令人孤獨，厭煩，脆弱。讀者的皺眉都會讓人覺得受辱，隨時處在驚慌失措的狀態，發現自己孤立無援之後，便像個孩子一樣，覺得任何人都要給自己糖果，任何人的糖果都要讓自己舔一口。

我始終覺得，只有邪惡的人才能創作。

邪惡讓我不會要求糖果，邪惡讓我呼吸，讓我貪婪地呼吸，讓我貪婪地想要謙虛，讓我貪婪地想要善良——成為任何人，也讓任何人成為我。

她邪惡嗎？不是。她只是在防止自己失去特殊地位——不想成為任何人，不讓任何人成為自己。

她像一個失憶患者，每天睡醒便擬定今日計畫，但日子一天天過去了，計畫的日期永遠都是同一天。

她是一個靜止的短跑者，永遠蹲踞在起跑點上，聲稱如果自己全力衝刺，必定能夠打破十秒紀錄，但十秒過後，自己就會永遠失去身分，變成平凡人，不佔任何優勢。

4.

「她還說，」父親接續話題，「她要寫書，把一切公諸於世。」父親說，「五年前，她跟我要錢，買一台蘋果電腦來寫作。但是在前天早上，她把我罵醒，說她的蘋果電腦沒有裝 word，是我故意的。五年了。」

母親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，抽出衛生紙擦眼淚，順便擤鼻涕，「她昨天晚上，也把我臭罵了一頓，說我把網路斷了，害她沒辦法寫作。」母親透過後照鏡看著我問：「兒子啊，你們撰稿，寫東西要網路嗎？」

不需要喔。我寫作都會拔掉網路線。干擾嘛，演算法什麼的很煩耶。就算沒有電腦，我也能用手機寫；就算沒有手機，我也可以用紙筆寫；有時候我什麼都沒有，我就會在內心默念數百次想寫的句子，或是乾脆休息睡覺。我最愛睡覺了，夢裡什麼都有。

父母笑得更大聲了。這應該是現代版的「綵衣娛親」。我的話語五彩斑斕，我希望自己七十歲時，父母依舊健在，我還能用邪惡的話語逗樂他們。

「兒子啊，」父母同時發話了。他們靜默了一下，彼此互換眼神，直到父親乾咳了一下，才由父親說：「你也成家立業了，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了，無論如何，用自己的生活方式過下去就好，明白嗎？」

這一次，我們三人都沒有笑。

「爸，你後悔過嗎？」

「後悔什麼？」

「生我啊，生她啊，或是投資破產。」

「其實，」父親說，「我轉念一想，那次金融海嘯，讓我——鬆一口氣？雖然很窮，但我不用再跟別人比較了。還記得你們的乾爹聶叔嗎？他不是後來都沒來我們家吃火鍋了嗎？因為他跳樓了。我不敢跟你們說。當時大家都這樣，壓力很大，都跳樓了。但我撐過去了。撐過去，終點就到了，過了終點，每個地方都能讓我跑，就像我現在這樣，我有時去河堤慢跑，我有時去山裡健行。」

「你反而自由了。」母親補充道。

「沒錯。」父親說，「回到我剛才說的，你也成家立業了，」他吞了一口口水，我在後照鏡看見母親朝著他點點頭，「你以後就別回來了。」

我笑了，如同轉動音響旋鈕，越轉越大，直到吐出一口戾氣，代表到頂了，又立刻轉至靜音。

「你有聽到嗎？你以後就別回來了。過年也是，她來我們承擔就好，就由我們扛，你還有家庭，你以後……」

我再度笑了起來，笑聲像風箏，越飛越高，讓車內只有風的赫赫聲。

「你有聽到嗎？我沒在開玩笑，我說……」

5.

如果我只是純粹描述一個邪惡的我，那是不夠的。我得描述邪惡的過程，才能將一則故事標準化，最後再加上一個突如其來的收尾，讓人驚愕，並且讓人們沉思，找出在其中缺失的對立物——善良。

但我發現，只要我越尋找善良，就會越脫離現實。

純粹的善良存在於太初宇宙之中，如果要尋找，就會失去呼吸。

於是我不斷大笑，強勢地大笑，間歇喘息，直到聲音變成結晶。

我不斷從結晶的反射中找出人物動機，盡可能進入人物的內心。

夢裡什麼都有。我曾夢過一個場景：在假日午後，母親喚醒我。我躺在客廳沙發上睡著了。膝蓋上是我的筆電和紙筆，我在撰稿。母親告訴我，你爸去釣

魚，等等煮魚湯，你可以幫我炒高麗菜嗎？我問一樣四人份嗎？母親疑惑，今天沒客人，三人份就好。她呢？她不吃飯嗎？

她是誰？母親問。我的寶貝兒子，你是不是睡糊塗啦？

夢醒了。我糊塗了。我發現自己在老家臥室，聞到年夜飯的味道。我走到客廳，發現她躺在客廳沙發上睡覺。你別吵醒她，母親說，你爸去買春聯，我們等等安靜地貼，太大聲吵醒她，她會生氣的。

以上有許多是虛構的，因為是夢。但夢有時來自防衛機制，大腦在演練危險；夢也是在清理現實中發生過的經驗殘餘，把不必要的東西清理乾淨。

我不停地大笑，因為我要讓身體明白，此刻的我很危險；我是邪惡，夢要將我清理乾淨。

6.

車子下了交流道，一側是河岸，有許多籃球場。我對父母說，我大學時常在這打籃球呢，後來也沒堅持下去，自己做什麼事都三分鐘熱度。

「大家都這樣。」母親提起自己工作之餘開始學插花，直到最近，她又更嚴重了。母親只上了兩堂的課，「很多人三分鐘熱度，都是迫不得已。」

邪惡也有三分鐘熱度。

我的手機突然響起，是她。

「你別接，一定沒好事。」父親說。我豎起食指，對他們比「噓」的手勢。我接起電話，按下擴音鍵。

我剛到台北，幹嘛？

「我鼻塞，門診要結束了。」

你打給爸媽，我等等要煮晚餐了。

「你以為我不知道嗎？我什麼都知道，你老婆剛剛在旗津打卡」

我在台北。你要看路牌嗎？我可以開視訊鏡頭。

「不准開。我什麼都知道，你一開，他們就會監視我。上次我一開鏡頭拍照，我的 IG 就跑出一樣的東西，他們都在監視我。」

你去看心理醫生了嗎？

「你不懂，我跟你說，這很複雜，這些韓國藝人公司很有錢，想弄垮我，操控我——」

你上次不是說，要看心理醫生，所以跟我借錢嗎？後來呢？

「你現在很激動，冷靜聽我說，這件事很複雜，跟金錢無關，他們媒體很有影響力，散播很多巧合，精神霸凌我。」

好，我立刻幫你報警，我先打給爸。

「你太衝動了，你要冷靜，警察不會幫我們，你打給爸，爸也不懂。」

那誰懂？

她沒說話。於是我繼續說。

我覺得妳說的沒錯，我懂你的處境，目前有能力幫我們的，就只有警察，父母，律師。

「你不懂，藝人的律師團隊都很厲害，你看什麼性侵家暴案，很多都一面倒。沒人相信我。」

我相信妳，而且一定有證據。

「那你認識那些律師？」

我不認識律師，但爸一定認識，他以前不是做工廠嗎？工廠一定有認識的事務所，爸一定有認識的人可以幫我們。

「你不明白。我跟你說，我什麼都知道。韓國操控 Line，會操控證據。」

所以才需要心理醫生，他能夠幫妳梳理脈絡，妳才有證據。我要煮飯了，我最後再問一句：妳要看心理醫生嗎？心理醫生能幫妳。不看的話，錢還我。

「唉，不跟你說了，我有好多事要忙。」

三分鐘。當我掛掉電話時，通話時間整整三分鐘。三分鐘的邪惡時刻。

7.

我癱軟在後座上，掩著面龐，用手指梳開頭髮，笑得嘶啞。我一點也不痛苦，這是邪惡的代價：帶來愉悅，表現自己，持續絕望。我表現得很殘忍，像卡通裡的壞蛋，讓主人翁把話說完。最可怕的邪惡就是言語不帶否定的邪惡。從電話那頭我可以得知，她深陷其中，深陷於一種好人與壞人的遊戲之中。我的母親也開始陪我大笑：「她說，她有很多事要忙，明明賴在家裡三十年了，從來沒有工作過……」我的父親剛開始只是微笑，但隨著油門越來越快，逐漸笑出了聲，笑聲好大，快要蓋過引擎聲了。前方是紅燈。父親緊握著方向盤，我知道父親不會突然猛踩油門。三十年了，我們足夠邪惡。足夠了。

額外的綠色房間

三坪大的宿舍房間。從窗戶往外眺望，是樹冠與陽光正在斑駁，而春天的枝枒彼此搏鬥；然後你又把沙沙聲比喻成咒語，好像暗示著這裡曾經死過人。那時候你正在翻譯，多麼希望除了英詩、德語詩、西文詩，你甚至能翻譯出樹的語言。波蘭的詩人會說，只要你凝視樹，樹就會帶你回到現實的向度，因為歷史就身處於它的內部與內部：於內，物種豐饒，只要肌膚碰到樹皮，臉蛋自動會有喜悅的神情——多年後，你去了一趟愛爾蘭，那是你心所嚮往詩人的故鄉，你觸碰了墓園最高的那顆紫杉，環抱著它，在心中跟它打招呼，並許下願望。身旁的大使先生笑著跟你說，好險你沒有破壞樹枝，因為所有不尊敬樹木的人，隔天都會死亡。而紫杉安扎在墓園的意義是：驅魔。那天晚上，你做了一個夢，夢到無可名狀的神靈也在跟你打招呼，夢裡面沒有清晰的畫面，只有一整片光暈和綠蔭。

博物學家會說，樹木總是激發出人性較好的那一面。1938年，納粹黨衛軍其中一隻小隊，受命前往各地，尋找歌德在歐洲內陸種下的兩百多棵樹，為了保衛這些已經茁壯成人的巨木，他們命令戰俘天天細心照看，倘若出現一丁點損傷，那怕是鳥屎，黨衛軍便會降下懲罰。人性叫好的那一面，也許比我們想像的更莊嚴，更殘酷，你不禁想起高中時讀過的一個句子：森森如蓋。這個詞，你不只在高中學過，更是在看到每一棵樹前，都會想起這四個字；然後你慢慢去思考，想到一件殘忍之事：豐饒是有代價的。那時你翻閱德文，為了翻譯心目中最好的策蘭（Paul Celan），但不免想再回去古代——古代稍微有點誇張，對你來說，在兩次世界大戰還沒發生，人性的極端還沒有超越毒氣與原子彈的時代，就是古代。歌德說，要是沒有極高的想像力，哪來的自然學家——用真實的尺規，去聯繫起萬物的能力。

有時候你會稱花蓮為「額外的綠色房間」，對你來說，那不僅僅是讀研究所的地方，而是另一個關於想像力與真實的所在。然後，是死亡。如同國中二年級的學生與狄倫·湯瑪斯（Dylan Thomas），死亡是一種倒裝的旅行，才剛結束，

生命又開始了；是晴天或是陰天，地形雨並沒有阻饒你前往圖書館。你蹲守在西曬角落的詩集區域，透過玻璃窗保護的烈日下，正在閱讀孫維民。陽光好烈喔，像是發高燒。在光線底下，人們都會相互自耗。